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主办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地方文化研究

· 第六辑 ·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编辑部 编

辑刊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主办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地方文化 研究 輯刊

DIFANG WENHUA YANJIU JIKAN

第六輯

《地方文化研究輯刊》编辑部 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6辑/《地方文化研究辑刊》
编辑部编. —成都:巴蜀书社,2013.3

ISBN 978-7-5531-0219-1

I. ①地… II. ①地… III. ①地方文化—文化研究—
中国 IV. ①G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3370 号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六辑)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编
编辑部

责任编辑	潘伟娜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http://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60mm×185mm
印 张	18.25
字 数	4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219-1
定 价	4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张小南 孙卫国

主 任 曹顺庆 李劲松 胡 丹 王政书

副 主 任 潘殊闲 彭邦本

编 委 (按音序排列)

蔡东洲 曹顺庆 邓经武 段志洪 范国英 冯广宏

冯修齐 冯永泰 高大伦 顾航宇 官性根 胡昭曦

黄尚军 纪国泰 江玉祥 李 钊 林 向 刘复生

刘小兵 栾道成 潘殊闲 祁和晖 沈伯俊 谭继和

万本根 王 川 王大清 王 方 王学东 吴会蓉

武小军 鲜乔葢 谢合明 谢应光 谢元鲁 徐学书

杨嘉铭 杨绍林 杨胜宽 杨 伟 杨振之 袁庭栋

曾加荣 张 帆 张 洪 张 力 张雪征 张在德

张志烈 郑家治 祝尚书 邹礼洪

主 编 潘殊闲

副 主 编 谢应光

责任编辑 潘殊闲 纪国泰 官性根 范国英 王学东

目 录

· 理论纵横 ·

“西川供客眼”

- 论西蜀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现代应用 谭继和 (3)
- 论四川的人文精神 曾枣庄 (23)
- 巴蜀哲学、蜀学、巴蜀经学概论 蔡方鹿 (36)
- 全球化语境下的身份认同焦虑：对地方文化、地域文化和区域文化的阐释
..... 范国英 杨天红 (41)

· 江源岷山与岷江流域文化研究 ·

- 略谈“江源岷山”文化认同的当代意义 徐学书 (49)
- 挖掘岷江源文化底蕴 建设“江源圣地”旅游景点 喇明英 (54)
- “江源岷山”历史文化认同文献辑录 梁 音 徐学书 (61)
- 岷江流域地方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新视野
——基于 2011 年度田野工作的认识 陈 剑 (73)

· 四川名人研究 ·

- 苏轼兄弟在熙宁二年的政治作为及人生命运 杨胜宽 (97)
- 张栻《太极解义》的完整再现 粟品孝 (107)
- 张问陶中期诗学思想嬗变初探
——张问陶诗学思想发展嬗变研究之二 郑家治 (112)
- 廖平与西学 杨世文 (124)
- 存蜀旧风，创作新志：刘咸炘《双流足征录》及其方志学 刘复生 (128)
- 民国刘家驹的康藏研究及其价值
——以氏著《康藏》为中心 刘 波 (132)

屈守元先生和川剧 张志烈 (141)

• 纪念李白逝世 1250 周年杜甫诞辰 1300 周年专题研究 •

李白与巴蜀故乡 祁和晖 (151)

杜甫与洛阳京城文化 葛景春 (161)

• 成都“北改”文化生态研究 •

成都北改工程如何注入文态之魂 谢元鲁 (179)

•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

三星堆人像穿耳纹身说 冯广宏 (187)

彭州方言中“脑壳有乒乓”等用语的研究 杨绍林 (194)

西礼乞巧中的“跳麻姐姐”民俗的文化内涵初探 荆自勉 (199)

• 地方文化广场 •

心神相通，根源相系

——海峡两岸哪吒文化探源 徐志福 (209)

史鉴·政论·哲理

——谈赵藩撰诸葛亮殿联语 张志烈 (213)

试析宋代四川州县长官在桥梁建设中的作用 官性根 (216)

小川北路纪行文献述论 金生杨 (222)

槐轩学派与新津老子庙诗碑楹联艺术 章肇源 (231)

• 开发与应用 •

探究西部中小城市文化强市路径：以泸州市为例 刘杨、唐任伍、黎川、李冲 (241)

绵竹年画的文化产业现状及发展 吴丹 (248)

百色靖西旧州绣球村绣球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陈雪军 何利娜 (254)

• 口述四川 •

大邑安仁镇人物访谈实录（二） 谢桃坊 伍文 (265)

四川老报人谈民国时期四川报业 何宁 (274)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征稿启事 (287)



理论纵横

“西川供客眼”

——论西蜀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现代应用

谭继和

内容提要：“西蜀文化”最早是由郭沫若提出来的，这个概念不仅可以成立，而且是巴蜀文化大区系内部再分若干特色小区加以研究所必需的，也是今后整个巴蜀地域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方向。“西蜀文化”可从文化的空间分布、文化发展的中心区域和区域之间的文化关系等三个方面来确定它的范畴、对象和内涵。西蜀文化基本发展的轨迹长达4500年以上，有三大特征：一是西蜀文化的基本轨迹，主要是指西蜀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二是西蜀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主要是农耕文明生长和发展的进程。三是西蜀文明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出现对中华民族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标志性成果和标志性人物，他们构成西蜀文化阶段性发展过程中文化进步台阶上的历史路标。今天的西蜀地区需要突出西蜀文化特色，建设西蜀特色文化城市群。

关键词：西蜀文化；内涵；特征；现代应用

作为文化学研究对象的“西蜀文化”概念，是谁最早提出来的？根据我的考察，是郭沫若于1934年7月9日在致当时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林名钧先生的信中提出来的。当时林名钧与葛维汉正在主持广汉玉器坑的发掘工作，郭沫若非常称赞。他根据这一发掘，提出了“西蜀文化”的概念，认为“西蜀文化很早就与华北、中原有文化接触。在殷代甲骨文上就载有‘蜀’称，武王伐纣时，蜀人协助周王作战”^①。他称赞林与葛二位是“华西科学考古工作的开拓者”^②，预言“有朝一日四川别处会有新的发现，将展现这个文化分布的广阔范围，并且肯定会出现更可靠的证据”^③。郭老当时就认为研究和发掘“西蜀文化”，

①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98页—399页。

②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98页—399页。

③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98页—399页。

“展现这个文化分布的广阔范围”，“这些是极为重要的问题”^①。由此看来，郭老确是最早提出“西蜀文化”概念和课题研究的第一人，葛维汉、林名钧是西蜀文化考古工作的开拓者，比卫聚贤 1941 年在《说文月刊》上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和课题要早 7 年。不过，郭老当时对“西蜀文化”的认识，主要是放在“探索四川史前文化”^② 范围内说的。近 80 年来，“西蜀文化”的考古工作已经有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不同凡响的惊人发现，研究工作也由狭义的“四川史前文化”扩而至于古及今的广义西蜀文化。所以，现在专门提出研究“西蜀文化”的课题，不仅这个概念是可以成立的，而且是巴蜀文化大区系内部再分若干特色小区加以研究所必需的，也是今后整个巴蜀地域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方向。“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③ 这正是我们提出“西蜀文化”的概念，以达到对整体巴蜀文化加以分区研究的原因，殷望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兴趣。

一、“西蜀文化”的定义

什么是“西蜀文化”？这可从文化的空间分布、文化发展的中心区域和区域之间的文化关系等三个方面来确定它的范畴、对象和内涵。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才可能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第一，从文化的空间分布研究状况看，中华地域文化，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出现了由大区系研究向细分特色小地域研究发展的趋势。苏秉琦先生把这种研究趋势欣喜地称为认识上的“分子水平”^④。他期待文化地域研究像物理学的分子解析一样，取得“理论突破”^⑤。

中华文化大区系的研究，是学术界最先取得的成果，李学勤先生以东周时代列国为基础，把“原史时期”（protohistory）分为七个文化圈，包括中原文化、北方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滇文化、秦文化等七个圈，这是以地域和古国来命名的^⑥。苏秉琦先生则把古中国文化分为“六大考古学文化区系：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是以古文化区间和地域发展脉系作为标准来划分的”^⑦。从上述两种分类可以看出，巴蜀文化区，如若从长江流域看，它作为长江上游文明，与长江中游的环洞庭湖是同一系的。如若从西南部地域看，它则同滇黔文化是同一系的。这样的分类能使人认识巴蜀文化在整个中华地域文化大系中的地位问题，但没有完全解决对巴蜀文化区自身特征、渊源和发展道路的认识问题。后来，因三星堆考古发现而促使他们把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化区”单独提出来，作为独立的一区。这个分法进一步启发了学者们，即使这样把“巴蜀文化区”单独划出来，

①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98页—399页。

②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98页。

③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98页。

④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37页。

⑤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37页。

⑥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1—12页。

⑦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35—37页。

也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像物理学上解析“分子”一样，再把它划分为若干文化小块，如苏秉琦先生所主张的，以现有的市为单位进行研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现行行政区划中的200多个省级以下的专区一级（现大部分专区已改为省辖市），以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有历史来源的中等城市为中心，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起作用的历史渊源，就是指相当于这些专区一级范围的考古文化区系，是产生古城古国的基础。秦汉设郡大致都是以现专区一级范围的古文化古国为基础的。”^①顺着这个思路，可以把巴蜀文化分为蜀文化区、巴文化区。再往下分出西蜀文化区，再往下，以产生古城古国文化的成都平原为中心，每个区、市、县可成为一个独立单元的文化区域，也可整合为东南西北各一个文化区域，加以分小区小块的文化单元研究。

苏秉琦先生的文化区系说，是考古学的创新性理论的开端。“区”是指块块，“系”是指条条^②。按照这个理论，苏先生认为“四川古文化又可分若干块块”^③，而“成都及其附近几县从距今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距今三千年前存在着自成一系的古蜀文化区系”^④。这里说的“自成一系的古蜀文化区系”，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研究的“西蜀文化”。

西蜀文化的区域范围，主要是指古称“三蜀”——蜀郡、广汉郡和犍为郡的区域。按常璩《华阳国志》对蜀国的地域界定是：“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眉，地称天府，原曰华阳。”大体包括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西部。从水系文化来观察，则主要是指岷江沱江流域的文化、青衣江大渡河流域的文化、金沙江流域的文化三大支。而它东边的巴文化，则主要指“三巴”（巴郡、巴西郡和巴东郡）区域。从水系文化观察，则主要指渝水（嘉陵江）流域的巴渝文化、渠江流域的巴渠文化和涪江流域的巴涪文化三支。涪江大体可视为巴和蜀的分界水。整个巴蜀文化包含蜀文化和巴文化两大支。它们是既有各自始源和特色，又是同根同源、同质同体、亲缘相近、互相融会的两支文化。学术界对整个巴蜀文化共同体的渊源、发展道路和总体特征已有共识和研究基础，现在需要对这个文化共同体进一步按不同地域的特色分解进行研究。这是把“西蜀文化”作为巴蜀文化圈内的一个特色区域加以研究的第一个缘由。

第二，从地域文化发展所形成的中心区域视角看，西蜀文化发展区是巴蜀文化圈的核心发展区域，也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重点发展高地，更是中国与南亚关系发展的“龙头”^⑤。

就整体巴蜀文化区系来看，它自己独特的文化渊源和发展道路，有自己的发展主轴和基本特征。这些要素都集中体现于巴蜀文化区系内的历史发展中心。这个中心有着标示该区系历史发展主轴和文化地标的的作用。这个中心指的就是成都平原为主的西蜀文化发展区域。更进一步说，这个中心是指从蜀郡和成都府发展而来的今全域成都。今成都市是从古至今巴蜀文化圈历史发展的地域核心。

以成都平原为主要地域的西蜀文化，有万年以上“肇于人皇”的文化起步，有距今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145页、85页。

②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145页、85页。

③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145页、85页。

④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83页。

⑤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85页：“就中国与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可以说是‘龙头’。”

4500年至5000年以上古城、古国和古方国三部曲的文明起源和文化发展的历史。巴蜀统一形成一个区域文明，是一个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基础和演进舞台，经过互补互融、交流融会，取得巴蜀人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的长期发展过程。从古到今，巴蜀文化的性质和内涵屡经变异，但其内涵的特异性和文化认同的牢固性程度是越来越高的。它以这种特异性和牢固性，而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的一朵奇葩。“西蜀文化”在其中起了中心凝聚和圆心辐射的巨大作用。“西蜀文化”以其几千年发展的中心凝聚体而成为需要独特研究的对象。

再从中国文化的大局视野来看，“西蜀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还有“龙头”的作用。《史记·天官书》说：“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这不全是自然地理的描述，而是司马迁以文化视野观察的文化成果。中国山川西高东低，像一条巨龙由西向东蜿蜒而下，直奔大海。这是古人认为的中华地域文化的龙脉，也叫直根系。应该说从自然地理方面看，西北最高处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是这个龙脉的龙头，但司马迁却不这样看，他认定“陇蜀”（即青藏高原的东麓，降下一级阶梯，一般海拔在2000米以内的山川）为“龙首”。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海拔4000米以上，不是中华文化最早发生的地方，而2000米左右的岷山即“陇蜀”地区反而是人类开发最早、文化最早发生的地方，故岷山是中华文化龙特别是长江文化龙的龙头。岷江是文明最早开发的地方，故被称为“江源”，具有“龙头”的地位。放在这样一个中华文化大格局中来看，西蜀文化区应该属于“维首在陇蜀”的重要核心区域。再放大来看，“四川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是周、秦、楚的同盟者活动地区”，“是西南地区的重镇”^①。西蜀文化区在中华山川文化地理龙脉上，占有“维首在陇蜀”的“龙头”地位。

第三，从各地域之间的文化关系互为条件的视野观察，西蜀文化与巴蜀文化以及与邻近的文化区域，特别是同楚文化和秦文化有着特殊的互有差异、互为条件、互融互补的关系。因此，便把“西蜀文化区”突显出来，成为一个独特的历史发展区域。

先看巴蜀文化区系。

从古到今，蜀文化与巴文化从始源的特异到发展的交融，经过长期的历史融会与文化认同，互为条件，形成了一个亲缘相近、刚柔相济、相反相成、相辅相依的紧密的文化共同体，但又各自在自己区域传承着各自的特色和差异。在这个意义上，“西蜀文化”的概念等同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文化。如果把蜀文化视为包括横断山脉和川西高原更大范围的文化，那么，“西蜀文化”就是这个大文化范围的同义语。

再看巴蜀文化与秦、楚文化的关系。

西蜀文化同楚文化与秦文化有着特殊紧密的关系。楚文化是影响整个南中国的文化。它对巴文化的影响比对蜀文化的影响更大。从大范围说，巴、蜀都属于楚文化辐射和融会的区域，从精神文化范畴说，都属于南方巫文化的范畴。当然，各个地域文化之间是相互影响，双向交流的。但不能不承认楚对蜀的影响比蜀对楚的影响更大。不过，在双向交流中，又各自保持了自己的特色。与北方中原文化重礼的特征不同，楚文化重巫，蜀文化重仙，巴文化重鬼，就是这三支文化统属于南方巫文化体系，而又分别扮演不同角色。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85页。

秦文化本属西戎。西周中叶，非子为周孝王养马，始成为周文化圈内的附庸。平王东迁，秦襄公起，才在西周故居的废墟上兴起，然后逐步东进，多次迁徙国都，最后定都咸阳。它既保留了土著西戎游牧文化的特征，又传承了中原文化，由中原文化的附庸变为中原文化的正统，形成了有独特风格的秦文化，重视耕战，提倡农商。西蜀文化在战国早期就因开明氏与秦国的交往而受到秦文化的影响。在秦国灭蜀以后，西蜀文化进一步“染秦化”，逐步向中原文化转型。它以“天府之国”农耕文明的天然丽质作基础，而朝中原文化向心和凝聚。在向中原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从汉代起，它逐步成为中原汉文化中一支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正是在秦蜀文化复杂错综的关系中，突显出了“西蜀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一个小型历史发展区域的价值。这是地域文化演变的规律。在两千多年来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中，西蜀文化区又分成若干地域发展，形成为更小一级的特色区域文化。今天的崇州文化就是在这个演进过程中，由汉江源县文化、晋时的晋原郡文化、萧梁的江原郡文化、北周晋原县文化、唐蜀州文化和唐安郡文化、宋崇庆府崇庆军文化、元崇庆州文化，演变为明清成都府的崇庆州文化。自民国改称崇庆县以来，发展到今天，就是今天的崇州市文化。西蜀文化区内的区、市、县都经历了这样的历史文化发展演变过程，成为各自小区域内的特色文化。

从上述三方面的分析，大体可以确定“西蜀文化”的概念范畴和对象是渊源有自的，由此不难给“西蜀文化”下个定义：“西蜀文化”是巴蜀文化共同体内，以成都平原为中心，扩而及于三蜀地区，具有独立而神秘的始源和神奇神妙为特色的发展历程，并具有从古及今的历史延续性和连续表现形式的、与巴文化同为巴蜀双子座一翼的文化。

二、西蜀文化生长与发展的基本轨迹

西蜀文化基本发展的轨迹长达 4500 年以上，有三大特征：

一是西蜀文化的基本轨迹，主要是指西蜀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由于这一进程中的发展和演变、融合与弥散、变异和转型，错综交织，而显现出发展的阶段性来。

二是西蜀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主要是农耕文明生长和发展的进程。这一进程又是以城市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为文化的主轴的。城市是部落社会被古代文明取代的产物：“从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转变是技术进步与社会变革相互作用的结果”，“最后促使城市革命和文明的到来”^①。城市中心的出现，是初期文明诞生的主要特征。城市文明的诞生，一般是同农业文明的出现相联系的。成都平原上城镇网络体系的诞生，则是从“广都之野”的古城文化出现时开始的^②。从文明诞生时的西蜀宝墩文化到近代城镇的发展，是西蜀文化几千年发展的主轴，是历代西蜀人利用自然环境以高超的文化想象力和创造力不断创新的城市生活模式的杰作，是西蜀文明最大的成果。

三是西蜀文明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出现对中华民族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标志性成果和标志性人物。他们构成西蜀文化阶段性发展过程中文化进步台阶上的历史路标。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 7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54 页。

② 参见拙文：《广都之野与古蜀农业文明的演进》，《中华文化论坛》，2009 年 11 月增刊。

以上文明进程、文化主轴和文化路标三方面是西蜀文化史生动鲜活发展的标志。根据这些标志，我们才可能勾画出西蜀文化史阶段性发展的完整图景。整个西蜀文化史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西蜀古城古国和古方国文明诞生和初步发展阶段、天府农耕文明优越秀冠发展阶段、市民社会下层民众文化初盛阶段、古典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百年发展阶段。这四个阶段构成西蜀文化发展的基本轨迹，也可以概括为西蜀文化发展阶段的“四段乐府曲”：“楔子”是古城古国，“正曲”是农耕文明和市民社会，“入破”是现代转型。这四段乐府曲，也可以称为西蜀文化“主轴四段论”。

第一，西蜀古城古国和古方国文明诞生和初步发展的阶段。以距今4500年前的成都平原十座古城为代表的宝墩文化为起点，昭示着西蜀由古文化的积累已发展到古城文明诞生的时代。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文化亮点是新津宝墩遗址，其古城总面积达270万平方米，可与新发现的良渚古城遗址相媲美。良渚古城遗址总面积达290万平方米。两座古城，一在东部，一在西部，规模相似，均具有当时当地古国国都的规模。此前各地发现的同时期的古城遗址，包括成都平原上的古城，规模大多都只在10万至30万平方米之间。与这些一般聚落相比，这两座古城遗址，应该分别是当地土著文化的王城遗址。这两座王城的发现，标志着良渚文化和西蜀文化都在四五千年前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改写了良渚文化与西蜀文化文明曙光初露时期的历史。

还有一个文化亮点是郫县古城遗址中心发现约550平方米的大型房址，内有平行的五个卵石堆的祭台遗址，应是西蜀人祭祀集会场所，它是西蜀城市文明起源的标志。芒福德·刘易斯曾经论证，各方人口朝觐的共同信仰的礼仪中心的出现，是城市起源的标志，是“城市发展最初的胚盘”。

再有一个亮点是古蜀第一代蜀王蚕丛时期“市”的出现。西蜀城市的兴起，包括成都在内，最初不是仰赖于政治权能，而是依赖于“市”的经济活动，达到一定规模即变为城。传说蚕丛时代，民众“随蚕丛所在致市焉，循环一十五处”。在成都平原上循环流动的15处市墟，就是由聚落演变为城市的基础，故古人要说“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大致反映了西蜀城市演进的历史进程。部落或聚落之间最早的原始交换活动，产生了循环流动的“市”，成都就是在“市”的基础上而成为“都”的。徐中舒先生把这种成都类型的“都”，称为“自由都市”，它体现了都市具备商业活动的深刻的文化内涵。西蜀古有“三都”：成都、新都、广都。在西南夷范围内，还有邛、笮、冉、骠、斯、榆六个都，皆具有“自由都市”性质，体现了西蜀城市文化一个重要特色。

三千多年前殷代中晚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殷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金沙遗址所展现的高度神奇神秘神妙的青铜文明，是西蜀文化发展到古方国阶段的标志。三星堆古城和金沙古城是先后古西蜀王国的王城。

苏秉琦先生曾经指出，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第一个发展路标是古国的出现。古国时代包含了古文化、古城和古国三个概念的演进：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文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这大体相当于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积累到文明形成的时期。由古国再向前发展就形成大的

古方国，方国的扩张则成为帝国，这是中国国家形态发展阶段的“三部曲”^①。

从西蜀考古文化的自成一系的区系，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西蜀文化也经历了上述“三部曲”。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握将这些考古发现同古蜀传说清楚地联系起来，说明古蜀文明和古蜀国家的形成过程，只能模糊地说一说。

从古蜀传说来检视，蚕丛、柏灌、鱼凫三代蜀王名称很有趣。蚕丛，从字面看，似指野蚕丛集，是采集经济原始食虫部族的写照。柏灌似与都江堰的观坝有关，是初级灌溉农业的写照。鱼凫即鱼鹰（鸬鹚），是渔猎经济生活的代称。这三个名称，正好同由原始采集经济发展到渔猎经济，再发展到初级农业与产牧相结合的时代演进序列相契合，这是西蜀特有的文化现象。

这三个时代大致同文明起源阶段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部曲”相当。第四代蜀王杜宇，是西蜀农祖，第一个开垦成都平原至富庶的人，教蜀亦教巴务农，被称为“土（杜）主”，是古蜀以农业立国而发展成大方国的时期。杜宇方国涵盖整个西蜀区域：“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②，“前门”指北至汉中之地，“后户”指西南至青衣水上下游。“玉垒峨眉”指九顶山、峨眉山，是杜宇方国的“城郭”，比喻富庶的成都平原是蜀国的中心，这个中心是被从汶川到南安这一带包围起来的，故用“城郭”比喻。蜀国内岷江、嘉陵江、涪江、沱江四大河流域，好比“池泽”，有渔猎田畴之利。汶山江源是畜牧之地，南中则是畋猎园苑。^③其地域范围刚好与西蜀文化圈相当。第五代蜀王开明氏共有12世，是水利兴农的大方国。从杜宇与开明称为望帝、丛帝的称谓看，至少可以说那时的西蜀已经发展到帝国的前夕。可惜这个文化发展主轴被秦灭巴蜀阻断了。秦国反而以巴蜀为基地统一了全国，西蜀以天府之国的天生丽质成就了六合宇内统一的秦帝国。总之，传说中的古蜀五代蜀王时代，蜀人的生息和发展，就植根于川西平原从宝墩古城时代到三星堆、金沙的古国和古方国时代这一系列考古发现的深厚坚实的文化土壤之上。

这一时期的文化亮点，首先是十二桥文化金沙遗址发展到成都平原腹心，为历代的少城区域奠定了基础。三千多年来，从金沙时期开始，成都城址再也没有迁徙过。成都是唯一“城不改址三千载，址不改名二千五”的文化城市。

其次是“古蜀仙道”传承三千年。《华阳国志》说：蚕丛、柏灌、鱼凫“皆得仙道”，“治国久长，后皆仙去”，鱼凫率其部民畋猎湔山得仙道。杜宇魂化杜鹃，升西山归隐，啼血唤醒农夫春耕，开明王上天成为天门兽，皆是仙化故事，皆因学飞鸟羽化而成仙。这些仙化故事正好同三星堆、金沙的遗物相印证。三星堆众多的青铜凤鸟形象、鹰头杜鹃形象、人身鸟足像、人面鸟身像，有龙有鸟（即龙凤）的青铜神树形象，金沙玉琮上线刻羽人像，直到太阳神鸟的形象想象，深刻地体现了羽化成仙的文化想象力的内涵，印证了“古蜀仙道”信仰^④。这一仙道思维在汉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蜀人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言神仙之事”，汉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130—131页。

②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8页。

③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0—121页，注10—13。

④ 参见拙文：《道源：古蜀仙道》，（台湾）《义守大学人文科学学报》2006年12月。

武帝读后“飘飘然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严君平的《老子指归》言仙学，为张陵《老子想尔注》仙学化奠定了基础，道教就是在古蜀仙道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西蜀是仙源故乡，是昆仑仙学的发生地。神仙说的产生，西蜀早于齐鲁滨海的蓬莱仙宗。

五代蜀王羽化飞仙的传说同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体现的如仙如幻的历史语境，显示出西蜀是蜀人最早羽化成仙的仰望星空的文化想象力的起源处。用今天的术语讲，就叫作蜀人多浪漫主义，想象力和联想性丰富。三星堆、金沙以仙化为特征的艺术思维，形成后世西蜀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显现出“西蜀自古出文宗”的闪亮特征。

以上亮点构成古西蜀文化发展主轴上的路标，成为蜀文化发展之路的阶梯。西蜀是巴蜀文明的生长点，是长江上游古文明发展的中心，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摇篮。

第二，天府农耕文明优越秀冠发展阶段，包括从秦汉到唐宋时期。这一时期由汉代“天府之国”，直到唐宋的“扬一益二”，是西蜀文化发展两次繁盛时期。这其中的三国蜀汉与五代前后蜀时期，又是这两个西蜀文化繁盛时期的光辉点和文化主轴上的重要路标。在西蜀从古至今的各发展阶段中，农业文明时期最长。“天府之国”丰庶的自然条件形成西蜀农业文明独有的“士民之庶，物力之饶，甲乎天下”的特征和蜀人“俗不愁苦，人多工巧”的生活方式。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特征，因其历史的悠长，而成为西蜀文化特质及其展现面貌的决定性因素。

这段时期作为文化路标性的亮点，主要有：

(1) 赢得“天府之国”的桂冠，创造了“天府之土，秀冠华夏”的历史纪录，进一步突显了西蜀“水利蓄殖其国”的农耕文明特征。都江堰这一世界水利史的奇迹，不仅是李冰开创，更是兴于西羌的大禹留下的“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利用回水沱分洪泄洪的治水经验的结晶，是开明凿离堆、开金堂峡智慧的产物。西蜀农耕文明早在考古上的古国时代就开始了。这个古国时代是以治水为特征。苏秉琦先生说：“四川有自己的治水传统，治水时代，即古国时代。”“三星堆是方国，四川的古国阶段可以从沿用至今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得到启发。这样巨大的工程，不会是李冰父子一次治水成功的，‘深淘滩低作堰’，这不是关中黄土地带的治水经验，而是四川人的经验，是土著文化。”西蜀治水，主要是从泽地排水泄洪，而不是引水灌溉，这是西蜀农业文明初起时候的特点，是典型的泽地文明的特征。这一土著文化源远流长，其结晶是都江堰无坝自流灌溉工程及其生发出来的扇形水系，所以，邛崃河谷与成都平原，也是中国的农业起源地区之一。

(2) 西蜀城市的兴旺发展，当时居于世界城市的前列。汉代成都是全国五都之一，三都（成都、新都、广都）“号名城”，临邛是全国第一流冶铁城市。唐宋时成都为中心的益州获得“扬一益二”的美誉，号称“天下名城之冠”。而当时的世界形势，自东罗马崩溃以后，欧洲很快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世界城市发展普遍衰退，唯独汉唐中国一枝独秀，中国城市发展正在旺盛时期。“扬一益二”，成都在这一时期居中国城市的前列，甚至是数一数二的名镇之冠的标杆城市，当然也就是世界历史名城中数一数二的城市。这一时期，西蜀创造了世界漆艺中心，最早发现和使用天然气（临邛火井）、世界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标，最早的世界纸币“交子”的诞生地等世界第一、中国第一的历史文化纪录，不愧为当时世界的一流城市。

(3) “文翁兴学”，首创地方郡学，儒风流布，蜀学大兴，从兹比肩于齐鲁，其对当时和后代的影响所及，产生了“文章冠天下”，“以文辞显于世”的天下文宗，包括赋圣司马相如、“汉代孔子”扬雄、“海内文宗”陈子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宋代千古第一文人苏轼、爱国主义诗人陆游，出现了第一部词集《花间集》、第一部个人专集《禅月集》，出现了“西蜀自古出文宗”的传统。

(4) “蜀石经”的刊刻，从孟蜀广政年间始，至宋乾道时期，历时 230 年，刊刻十三经并注文，其规模为历代石经之冠，其精美程度为历代经书的范本，是学子校注经注的经典，它是十三经的首次完整结集，推动了儒家经典的法典化和“蜀儒文章冠天下”的发展。

第三，明清时期市民社会下层民众文化初盛时期。这一时期，遭遇宋元之际、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三度战乱摧折，西蜀生业和文化曾一度满目疮痍，但累次又复苏和再生，获得新的发展。但这一时期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始终没有达到汉唐规模，其在全国的文化地位也有所下降。不过，这时在西蜀社会文化中却也出现了不少新质因素，尤其是市民社会的文化因素，为西蜀城乡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使得有“川味”特点的下层群众文化和“俗尚游乐”的休闲文化与怡人文化兴盛起来。随着西蜀城市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以及适应市民生活的市民文化日益活跃起来。

这一时期可作为文化路标性的成就有：

(1) 川剧的兴起。川剧源于元北曲和明南曲，形成于清代中期雅部戏变为花部戏，地方剧种出现之时。乾隆年间金堂艺人魏长生创“四川秦腔”，在北京演出，轰动朝野，这是川剧的弹腔形式之始。川剧的五种声腔艺术就是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文化融会中形成的，成为地方戏曲中有特色的瑰宝。

(2) 西蜀是最早发现茶树、种植茶树的地方，是茶文化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茶馆的兴盛和普及是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点。许多茶馆兼有书场功能，是休闲生活的重要体验地。

(3) 川菜菜系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全国四大菜系之一。川菜传统特点是好辛香尚滋味，形成了三千年的独特传统。到南宋时，出现了“川食”名称，川食店开到了当时的汴京。陆游喜欢川食，自号“老饕”。到明清时，川菜（包括小吃）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菜系，影响直到今天。

(4) 在府州县的官学之外，兴起了书院教育。明清两代四川各地普遍出现了书院，如成都的子云书院、大益书院、浣花书院。清代的锦江、墨池、芙蓉、潜滨书院，均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四，西蜀古典文化向现代转型百年的发展阶段。近百年以来，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西蜀地域文化，受到近代和现代文明的冲击，进入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程。

1840 年以后，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西蜀文化，受到近代文明的冲击，在阵痛中迈着蹒跚的步伐缓慢地迈入近代化历程。特别是 19 世纪末期和 20 世纪初期，新旧文化激荡冲突，古老的西蜀文化出现激变和多彩的面貌，开始急速地向早期现代化转换和裂变。

传统文化转型的主题集中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破与立、对中西文化的体与用的不同看法和激烈论争。围绕这一主题，第一个重大事件是 19 世纪末的戊戌维新运动。作为启蒙运动，戊戌变法“是一阵思想的巨浪”，“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即新的思想意识时代”。它对